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辛亥革命
与近代中国边疆
政治变迁研究

冯建勇〇著



一编 · 综合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

• 013022707

D693
34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边疆政治变迁研究

冯建勇 著



北航 C1631429

D693/34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冯建勇著.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10
ISBN 978 - 7 - 5316 - 6166 - 5

I . ①辛… II . ①冯… III. ①边疆地区—政治—研究
—中国—近代 IV. ①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3140 号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

Xinhai Geming Yu Jindai Zhongguo Bianjiang Zhengzhi Bianqian Yanjiu

冯建勇 著

选题策划 丁一平 华 汉
特约编审 吕观仁
责任编辑 宋怡霏
封面设计 sddoffice. com
版式设计 王 绘 周 磊
责任校对 柳成栋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6 - 6166 - 5 定 价 50.00 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www. hljep. com. cn

如需订购图书,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451 - 82529593 8253466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451 - 82529347
如发现盗版图书,请向我社举报。举报电话:0451 - 82560814

TSVSS80810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
——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

编委会成员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厉 声

副 主 编: 丁一平 于逢春 李大龙

编委会成员: 丁一平 马大正 于逢春 王子今

王希隆 厉 声 吕一燃 李大龙

李治亭 李金明 李国强 邢玉林

林荣贵 周伟洲 魏存成

序　　言

边疆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就地域层面而言，是指国家毗连边界线、与内地（内陆、内海）相对而言的区域。一般而言，历史上中国的边疆是在秦统一中原、其重心部分形成之后确立的，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相应地，中国的边疆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并与国家和边疆的安危息息相关。

从近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过两次研究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史地学的兴起，国家边界沿革的考订、边疆民族发展的著述等，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标志。在边疆研究的热潮中，一些朝廷的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近代国际法的领土主权原则，与蚕食我国领土的列强势力相对抗。黄遵宪、曾纪泽等都曾以“万国公法”为武器，在处置国家边界事务中与英、俄列强执理交涉。在边疆研究领域，学者们开始将政治学、法学等与传统的史学、地理学等相互结合，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边疆学研究。

第二次研究高潮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在国家与民族危机激发下出现的又一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国际法与政治学方法也被广泛地运用到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之中，边政学的创立与研究、以现代学术新视角和新方法对中国边疆进行的全方位研

究，是这次高潮的突出成就；研究内容也从边疆领土主权、历史地理扩展到民族、语言、移民、中外交通等领域。与此同时，边疆考察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也愈益受到重视。

两次研究高潮的实践与成果，实现了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中国史学研究向现代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转变，为中国边疆研究学科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兴未艾。继而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带来边疆学研究的三度兴起。此次研究高潮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初，兴盛于90年代，至今热度不减。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成立，这既是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三度热潮的产物，也进而成为国家边疆研究的前沿引领者。

近30年来，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很多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而且以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特点，成为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的优秀作品，对学科建设和发展、对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已形成了从最初以中国近现代边界研究为主，发展到以古代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近年，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在继承和弘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遗产的基础上，已逐步形成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而为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模式。

边疆中心所实施的应用研究，是以当代我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现状为切入点，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紧要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中国边疆研究不但要追寻边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轨迹，还应探求边疆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当代我国边疆现状研究首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我国边疆区域的发展现实，促使中国边

疆现状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新的学科定位：即将中国边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现状与历史不可分，现状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历史的现状，所以要进一步加强历史的和现状的综合性一体研究。通过对学科布局的适时调整，中国的边疆研究不断取得学科突破和新的学科增长点，进而尽快实现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中国边疆研究的过渡。

短期内，我国在中国边疆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必须明确主旨，并应该有大的突破。在深化实证研究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理论研究投入的力度，不断探索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发展的规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努力为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人文发展和变迁构筑理论体系，是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近30年来，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为中国边疆疆域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未来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边疆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化，需要理论层面的支撑。在中国古代历史疆域理论、历代边疆治理理论，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的发展规律、古代边疆民族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的发展规律等方面，以及在近现代陆疆、海疆与边界的理论问题等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进一步构建我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边疆研究学科的发展需要尽快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包括边疆学学科的概念、界定与范畴，学科性质和功能，学科体系构建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近年来，国内数所大学以开设边疆学博士点为契机，也在加紧边疆史地学科的构建；一些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先后以“中国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学科定位建立了相关的学科专业；围绕边疆研究先后出

现的相关学科命名有边疆政治学（边政学）、边疆史地学（边史学）、边防学、边疆安全学（边安学）等。但从学科层面看，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缺乏基本学科框架的规范系统论证。在诸如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及整体构建等方面还需要做更多深入研究；在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尽快拿出较为成熟的成果。同时，应注重学科理论建设与方法论的进一步开拓，在原有的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等为主的基础上，扩展引入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理论与方法，进一步突出边疆研究作为跨学科、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特点与优势，不断加快学科建设步伐。

学术研究与研究成果的出版是并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当组建不久的边疆中心在成果出版方面寻找出路的时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与敏锐的学术眼光，伸出了合作之手。一晃至今，双方精诚合作了20多年。先是以《边疆史地丛书》的形式，自1991年3月开始出版，截至2011年，先后有70余种边疆研究著（译）作面世。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持续有力地推动着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不断发展。如果说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方面成为了学术前沿的引领者，那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则以边疆研究成果的出版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出版社。

在当前我国边疆研究氛围持续高涨的形势下，经边疆中心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共同努力，将以更为严格的科学态度、更为严谨的学风文风，共同出版水平更高的边疆研究著作。双方遂决定以《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的形式，由边疆中心组稿审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由《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近代稀见边疆名著点校及解题》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两部分组成。前者共选出近50种近代以来

面世的我国边疆研究学术著述，在实施点校的基础上，作出导读性与研究性的解题，予以重新出版；后者选择近50种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边疆研究的老一代知名学者、中年有为学者、年轻后起学者的著述，汇集出版。可以说，这些著作基本代表了目前我国边疆学研究的水平。

同时，对1949年后有较大影响的边疆研究著述又进行了修订出版，特别是将新近的研究成果充实其中，使这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内容更加翔实、完整，更具学术价值。

今天，中国边疆研究已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显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尚属开创之举，一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帮助、批评指正。同时，我们也有信心，在目前《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二编近100部著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努力开拓进取，组织更多边疆研究的优秀成果，继续出版三编、四编……为我国边疆研究的持续兴盛，为繁荣边疆的历史文化，为今天我国边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库》系国家出版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办大手笔支持我国的出版事业，本《文库》是无法面世的。在此，请允许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主编谨识

目 录

序 章 问题设定与研究方法	(1)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课题	(1)
一、研究的目的	(1)
二、研究的对象	(17)
第二节 研究的方法、内容及其构成	(18)
一、研究的方法	(18)
二、研究的内容及其构成	(24)
第三节 先行研究的检讨	(25)
第四节 原始资料及关联资料的检讨	(32)
一、中国政府档案及相关官修史料文献	(32)
二、外交文书和外文档案资料	(36)
第一章 清末之边疆治理与周边国际局势	(39)
前 言	(41)
第一节 清朝“边疆民族自治模式”	(42)
第二节 列强对边疆的渗透与清政府之回应	(47)
一、俄、英在新疆的博弈	(47)
二、俄国对外蒙古的渗透	(53)
三、英、俄两国在西藏的角逐	(58)

四、清政府的战略回应	(76)
第三章 清末边疆地方主义的“政治化”倾向	(107)
一、西藏宗教地方主义政治化倾向	(107)
二、外蒙古王公贵族地方主义的政治化倾向	(114)
三、新疆区域地方主义之发展	(120)
小 结 近代国家模式下清政府对边疆的统合及 成效评价	(125)
第二章 辛亥革命对中国边疆的冲击	(131)
前 言	(133)
第一节 新疆——巨变后的“塞外桃源”	(136)
一、从迪化起义到伊犁起义	(137)
二、新、伊对抗：从战争到和谈	(139)
三、哥老会戕官运动与哈密农民起义	(141)
四、“新秩序”的构建：杨增新主政	(143)
第二节 外蒙古——俄国庇护下的“独立”	(148)
一、库伦乱事与外蒙古“独立”	(148)
二、外蒙古“独立”与内蒙古之内乱	(153)
三、清政府对外蒙古“独立”活动的应对	(156)
第三节 西藏——混乱中的“自治”	(161)
一、川军入藏与拉萨乱事	(161)
二、“驱汉运动”	(165)
三、川边局势与川滇出军援藏	(170)
第四节 清朝祚灭与边疆民族归属感的迷失 ——对蒙藏边疆与新疆的比较研究	(172)
小 结	(179)
第三章 列强对边疆政策之调适	(183)
前 言	(185)

第一节 俄、英两国对新疆政策的调整	(187)
一、俄国对新疆政策的调整	(187)
二、英国对新疆外交政策的延续	(193)
三、俄、英对新疆政策分析	(196)
第二节 俄国对外蒙政策的调整	(199)
一、对外蒙政策演变的背景与依据	(199)
二、“两步走”战略之实施与《俄蒙协议》	(201)
三、中俄交涉与中俄蒙协议	(209)
四、俄国对库伦当局关于内蒙古政策之反应	(213)
五、对俄国在外蒙古政策的分析	(217)
第三节 英、俄对藏政策的调适	(219)
一、英国对西藏政策的演变	(219)
二、英国绕开干预藏事之障碍的努力与英、俄的政治交易	(224)
三、英、俄对藏政策分析	(229)
第四节 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列强对边疆政局之影响	
评价	(231)
一、所谓的边疆“自治”：“自治国”或“自治地方”	(232)
二、社会舆论对边疆问题的呼吁与检讨 ——以西藏问题为中心	(239)
三、简单评价	(247)
小结	(247)
第四章 民初中央政府对边疆情势之应对	(253)
前言	(255)
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对边疆局势之应对	(257)
一、对外政策基本方针的确定	(258)

二、对边疆政策的宣示与颁行	(259)
三、南京临时政府统合中央与边疆关系实效评价	(262)
第二节 北京政府的边疆政策及边疆之反应	
——以蒙、藏问题为中心	(264)
一、从“独立”到“自治”: 民初中央政府对外蒙问题 的处置	(264)
二、对西藏问题的斡旋	(272)
三、北京政府统合中央与边疆关系实效评价	(276)
第三节 认同的重构: 民初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之 统合	
一、从“排满”到“五族共和”直至“中华民族” 的形塑	(278)
二、怀柔蒙、新、藏等边疆民族上层	(283)
三、通过立法确立蒙、新、藏等边疆地区的 法律地位	(285)
四、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蒙、新、藏等边疆地区的 管理	(287)
五、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统合	(290)
六、认同理论框架下的检讨	(293)
第四节 辛亥革命以来“省自治”在边疆地方的流与变 ——对蒙、藏边疆与新疆政治性格的比较研究	
.....	(295)
一、辛亥革命与各省地方主义的互动: “省自治” 的发端	(295)
二、“省自治”在边疆地方的流与变	(298)
三、民初边疆“自治”的比较分析	(310)
小 结	(313)

结 章 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中国边疆	(316)
第一节 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边疆政策与边疆 社会	(316)
第二节 作为“他者”的列强与近代中国边疆意识之 构建	(323)
第三节 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构建历程中 的地位	(328)
第四节 本研究的限界、展望及今后的课题	(335)
参考文献	(338)
一、基本史料	(338)
二、先行研究成果	(345)
三、硕博论文	(362)
四、外文论著	(363)
后 记	(370)

序章 问题设定与研究方法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课题

一、研究的目的

(一) 从文化至上主义到民族主义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夏中心观，是以信仰“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为其认识前提的。古人相信自己居于天下的中心，有中心就有四边。他们故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①。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开篇即言：“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

鸦片战争以前，华夏民族处于一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相对充足或完满状态，享受着作为世界中心民族或强盛民族的古典荣耀。华夏对自己作为“天地之中”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深信不疑，从而自信地把自己形容为“夏”或“华夏”；同时，

^① (宋)石介：《中国论》，载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1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在这位“自我”看来，作为外来客人的边缘“他者”总是野蛮、弱小的少数民族，即属于“夷”或“夷狄”。由于这种明显的自我与“他者”的权力差异，“华夏”自我才可以具有足够的自主和自信，可以“虚怀若谷”地向外来其他民族即“夷狄”开放。其实，也正是由于有了四周“夷狄”这面“镜像”，这位“自我”的位置和权威才得以确证。无论如何，在古典中国的民族关系图景中，华夏民族是最优的，而四周民族处于从属地位。于是，古典性的中国形象形成了：“中国”如“夏”，位于宇宙模式的中心，享有号令天下的最高权威；而周围各国如“夷”，位于这个模式的边缘，必须向“中国”臣服。这种中国形象可以用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的描绘来形容：“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而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则令人想起这个“天朝上国”的赫赫威仪。

与华夏中心观相联系的，是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尊夷卑观。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各民族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参差不齐。既然“华尊夷卑”，所以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特别强调“华夷之辨”或“夷夏之大防”，也就是强调民族之间的区隔。这种区隔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种族的区隔，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族是区隔夷和夏的标准，换言之，判断一个人是夷或是夏，主要看他出生于何种种族；另一种是文化的区隔，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文化作为区隔“夷”和“夏”的标准。就此而言，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一种种族民族主义的观点是片面的，种族民族主义只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一个面象，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或可更为贴切地称之为文化至上主义。而且中国历史长河中，更多的时候是文化至上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詹姆斯·哈里森就注意到：“传统中国人的自我形象被定义为‘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前者是基于一份对共同的历史

遗产以及一种共同的信念的认可，而后者则建立在‘民族国家’这一近代观念的基础上。”^①他强调，自从始于前221年秦帝国的大一统以来，这种自我形象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年，它并没有妨碍某种政治的或民族主义的效忠。帝国历史的漫长岁月提供了关于爱国主义、种族独特感、排外情绪，以及献身帝国制度和统治王朝的一些事例。但是，中国人的认同主要是文化的。一个脱离文化遗产的中华国家或民族是不可理解的，至高的忠诚依附于文化本身而非国家。

文化至上主义拥有这样一种信念：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疆界由体现中国精英文化传统基本原则的知识与实践所决定：这个共同体是独特而不可挑战的，因为它是世界上的唯一真正的文明：它处在一个皇帝的妥善统治之下，这位皇帝对他的臣民包括所有加入到这个文明中的人都具有绝对权威；皇帝与他的官员的政治权威在原则上有赖于博学多才，尤其是通过道德楷模来实施统治的学识与能力。这一系列信念对于它所确定的共同体有着若干重要含义。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信念明确规定了一套独特的文化标志；这套标志有别于并且独立于那些以族群为界限的更为普遍的文化类型。各民族均可以通过接受这些原则而加入该共同体，如果不接受则将被排除。这是在思想上对原则、而不是对一个人出生时所置身的特定文化的信奉，因为那些原则是可以被传授或抛弃的。共同体的确切成员与疆界可以发生变动，只要在一些重要的区域内依然保持信仰。同样，统治者可以获得或失去其合法性，因为这合法性基于对原则的熟练驾驭或示范，而非种族背景。^②可以这样认为，文化至上主义作为一种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解释了汉族统治非汉族以及非汉族统治汉族的合

^① 詹姆斯·哈里森：《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2页；纽约，亨特学院现代亚洲研究所，1969。

^② 詹姆斯·汤森：《中国的民族主义》，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1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